

王仲荦 主编

历史论丛

第一辑

齐鲁书社

历史论丛

第一辑

王仲荦 主编
葛懋春 编辑

齐鲁书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历史论丛

第一辑

王仲荦主编

葛懋春编辑

*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济南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5印张 285千字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11206·26 定价1.35元

目 次

孔子与《春秋》	徐中舒 (1)
论孔子的仁学	吴乃恭 (8)
《论语》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”解	于省吾 (30)
墨子思想研究	童书业遗作 (35)
《易传》作者的思想述评	高 亨 (79)
荀子的音乐思想和诗赋	孔 繁 (117)
中国佛教的特点	任继愈 (128)
名理学概述	庞 朴 (138)
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历算	
诸学之传入中国及其影响	张维华 (149)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评	章太炎遗作 (179)
论章太炎的哲学思想	杨向奎 (205)
章太炎的《社会学》	汤志钧 (246)
章太炎与《清建国别记》	袁英光 (258)
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哲学思想	楼宇烈 (283)
试论蔡元培的历史贡献	罗 超 (320)
陈独秀和《安徽俗话报》	沈 寂 (342)

孔子与《春秋》

徐中舒

一、《春秋》的作者

孔子作《春秋》说，首见于《孟子》，后来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即祖述其说。但《左传》只说《春秋》“非圣人谁能修之”，又说：“是以君子贵之”，不能质言“圣人”“君子”为谁。

过去学者以《鲁春秋》为鲁太史作，孔子作《春秋》即就《鲁春秋》加以笔削。其实《鲁春秋》与《春秋》并没有什么不同。《礼记·坊记》引用《鲁春秋》原文三处：

一、子云：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，示民有君臣之别也；《春秋》不称楚越之王。”

二、子云：“升自客阶，受吊于宾位，教民追孝也，未没丧不称君，示民不争也；故《春秋》书晋丧曰：‘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。’”

三、子云：“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，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；以此坊民，《鲁春秋》犹去夫人之姓曰‘吴’，其死曰‘孟子卒。’”

上引三条，第一条今《春秋》经文书吴楚越之王曰“子”，《坊记》作者认为即《鲁春秋》原文；第二条今《春秋》经文于僖公九年

书“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”，于僖公十年书“晋里克弑其君卓”，前者称杀，后者称弑，似与《鲁春秋》以“杀”字连贯下文不同，案此弑字当出后人所改，公羊本《春秋》经文“杀其君之子奚齐”的杀字亦改作弑，监本则仍作杀而读为弑，可见此两弑字皆非《春秋》原文；第三条今《春秋》经文于哀公十二年书“孟子卒”，完全与《鲁春秋》同。

《韩非子·内储说右上》也引用《鲁春秋》一处：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“《春秋》之记曰：‘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’，何为记此？仲尼对曰：‘此言可杀而不杀也，夫宜杀而不杀，桃李冬实；天失道，草木犹犯干之，而况于人君乎！’”

今《春秋》经文僖公二十二年下有“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”一条，《韩非子》所引“草”作“菽”，当涉下文定公元年“冬十月陨霜杀菽”而误。周之十二月为夏历十月，菽早已刈获，不应有不杀菽之事。周之十月为夏历八月，正菽届熟之时，周十月陨霜杀菽则为灾，十二月陨霜不杀草亦失常，故均记之。王先慎《韩非子集解》也说“‘菽’当作‘草’，下云：‘草木犹犯干之’，承此而言，明菽为草之讹。……前经注（案指《韩非子》旧注）引正作“草”，明注所据之本，尚未误。”

如上如引《坊记》和《韩非子》所称《鲁春秋》，皆与今本无异，可见《鲁春秋》并未经过孔子笔削。

《春秋》是鲁国国史，不是孔子家传，而今《春秋》经文一本（公羊·谷梁本）记孔子生年，一本（左氏本）记孔子卒年，孔子如作《春秋》记自己的生年是不是恰当呢？他又怎能预知自己的卒年呢？《论语》称孔子“信而好古”，又说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这都和作《春秋》之说合。

《春秋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，是鲁太史世代相续按年、时、月、日秉笔登记的档册。鲁昭公二年（公元前五四〇年）晋韩宣子聘鲁，在鲁太史处见到此书。《春秋》终于获麟或孔子卒（公元前四八一年或四七九年），其间尚有六十年的历史还要鲁太史继续编写，孔子那能取未曾公布的国史擅加笔削呢？

《春秋》应是鲁史旧文，其中如“郭公”“夏五”之类，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，但在长期转写流传中也难免没有一点改动。《公羊传》说：“不修《春秋》曰：‘雨星不及地，尺而复’，君子修之曰：‘星陨如雨’。”《春秋》旧文“雨星不及地，尺而复”，语词冗赘，今《春秋》经文“星陨如雨”，也只在修词方面加以润色，并无微言大义可言。至如《春秋》孔子生卒，这必然是出于孔子弟子之手。据此言之，司马迁说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”，就完全是虚构之词了。

二、春秋时代的文献资料

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，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。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，但有关历史的传习，也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形式。当时有两种史官，即太史与瞽蒙。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，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，因而就称为瞽史。所谓“史不失书蒙不失诵”，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，还要通过瞽蒙以口语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。这在人类历史上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瞽蒙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“语”，如《周语》、《鲁语》之类，《国语》就是记录各国瞽蒙传诵的总集。因此记录孔子遗言，就

称为《论语》，记录古代传说故事就称为“说苑”，后来禅宗和理学有“语录”，小说有“话本”，皆以记录“语”“话”得名。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有“教之春秋”“教之语”之说，“春秋”和“语”就是当时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文献。

瞽蒙是乐官，同时也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，后来瞽蒙失职，他们还要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。南宋陆游诗说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；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！”瞽蒙说史，从春秋迄于近世，一直是他们社会分工的职业。

《左传》相传为左丘明作。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，又称其失明或无目。左丘明以左丘为氏，省称为左氏，古代只有贵族称氏，君子也是封建社会君主等级制下各级君主子弟的通称，他们都是当时的贵族。据此言之，左丘明并不是一般的乐工，他出身于鲁国贵族，同时也是最有修养的瞽史。

左丘明大约与孔子同时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巧言、足恭、佞色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；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寻绎《论语》词意，左丘明传诵历史，对于历史人物评价是孔子所同意的。孔子丰富的历史知识，主要是从这方面来的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与太师挚、师冕，击磬襄都有往还，就是很有力的说明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所依据的资料大部分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，所以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“成《左氏春秋》”，又说“左丘失明厥有《国语》，他将此两书作者都归之于左丘明，在传授的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。

如说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孔子时代这些瞽史传诵的历史还没有笔录成书，《鲁春秋》之外孔子又依据什么资料进行笔削呢？

三、孔门两部重要经典

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是孔门两部重要经典。《诗经》是孔子生存时代得自鲁太师，《春秋》是孔子没后孔门弟子得自鲁太史。

孔子时代《诗经》除商颂外，都是周部族内部经常演奏的乐章。孔子说：“不学诗无以言”；“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犹正墙面而立；”当时诸侯燕飨及乡人饮酒，宾主酬答，无不歌诗以见志，不学诗就不能歌咏诗篇表达自己的意愿；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就要孤立于部族之中，也与正墙面而立无异。孔子时代诗在周部族间还要经常发挥兴、观、群、怨的作用，使部族内部意志情感得到通畅和鼓舞，这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社会生活中必须学习的经典。

战国时代社会各方面都起了显著的变化。首先是三家分晋，田氏代齐，使周部族中两个最大的霸国亡国绝世了。当时各国扩充兵源行乘马法，使春秋时代的千乘之国转瞬之间就成为万乘之邦。过去不服兵役的野人，现在也与国人同服兵役，因此部族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复存在了，诗经在这样新环境下还能发生什么作用呢？

孔子对于《诗经》曾经作过一番整理捍卫工作。《论语》称：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”；孔子对于鲁卫从西周传来的雅、颂，曾用卫乐校正鲁乐，孔子为捍卫雅乐，对于新起的郑声就深恶痛绝地大声疾呼说：“放郑声，远佞人；郑声淫，佞人殆！”他又正告当时有国有家者说：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复邦家者！”孔子以郑声比于佞人，比于利口复人邦家，后人谓郑卫之声为亡国之音，即本孔子此说。

郑卫新声代兴，古乐沦亡，已是当时不能避免的趋势。乐记说：“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”；正说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。孟子说：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”，诗亡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了。

鲁哀公时礼坏乐崩，太史和乐官相继离开鲁国散游四方，《论语》称：“太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”；同时，孔子弟子在鲁国找不着出路，也纷纷地去游说诸侯。《史记·礼书》说：“仲尼没后，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，或适齐楚，或入河海”；同书《儒林传》说：“子路在卫，子张居陈，淡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终于齐。”孔子生存时代与鲁国的太史和乐官经常都有往还，乐官职掌的诗篇既已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，孔子没后鲁国官府典籍开始丧亡，孔子弟子又与太史和乐官相偕去国，《春秋》继《诗经》之后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，也应是孔子弟子责无旁贷之事。孟子说：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，”《春秋》古文经终于孔子卒，这也说明《春秋》的流传，必在孔子既没古乐沦亡之后。

四、《春秋》书法与孔子遗教

《春秋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。齐太史为了直书崔杼弑君之罪，就前后相继以身殉职。书法也必须有广大的舆论支持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，然后才能使乱臣贼子惧。今《春秋》经书赵盾弑君，崔杼弑君，完全出自晋、齐太史的书法，有晋齐两国舆论的支持，因此，鲁太史才同意转录于《鲁春秋》中。同例，《竹书纪年》中有许多书法和《春秋》相同的，也应

是魏史作者审知鲁太史的书法有鲁国舆论的支持，因而才转录于《纪年》中。据此，可见书法是代表大多数人的舆论，而不是某人的私意。若说孔子作《春秋》仅取已往的历史陈迹而加以笔削，这样的“死后是非”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

孔子正名思想与“兴灭国继绝世”的主张，都是为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服务的，这和《春秋》的褒贬书法是有共同的基础的。

孔子时代《春秋》的历史问题以及当时人物评价，已为孔门教学的一项主要内容。如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所载：礼乐征伐所自出，鲁政下逮、晋铸刑鼎、子产政绩，皆有所论列，而对于管仲的评价，更不厌其烦的从各方面加以分析。孔子没后，孔门弟子要系统的总结孔子遗教为当前政治服务，有了《春秋》这样简明提纲，那就更为深切著明了。

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君主等级制开始向君主集权制（专制主义）过渡的时代，孔子要恢复君主等级制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局面，实际上这个局面更符合专制主义的要求。秦汉以后，孔子受到历代专制帝王的尊崇，这绝不是偶然的。

（一九六二年山东省历史学会主办第二次孔子讨论会讨论稿）

论孔子的仁学

吴乃恭

“孔子贵仁”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孔子的仁的内容是什么？孔子的仁是朝着谁提出来的呢？孔子仁的社会作用如何呢？孔子仁学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呢？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仅述一曲之见，请同志们指正。

—

孔子在《论语·颜渊》篇对他的仁的内容作了集中的说明。一则是“颜渊问仁。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另一则是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”孔子的仁的内容，简言之，就是“克己”和“爱人”。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行为。只有把“克己”和“爱人”两者结合起来了解，才能正确地理解孔子的仁的内容。

先谈谈“克己”。赵纪彬释“克”为“乃竭尽肩力，堪胜重任之意。”^①认为“克己复礼为仁”就是“能以亲身践履西周奴隶制就是“为仁”的实际内容。”^②这种训释，当然有理有据。不过也还有难解的地方，提出来敢以请教：第一，这样训释同非

①②《“仁”“礼”解故》，见《新建设》1962年第2期。

礼四勿的关系结合的不够切合；第二，这样训释同认为“此章以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为‘为仁’的条目，实即以‘礼’约‘己’之义。”（同上。重点是引者加的。）相为矛盾。

我同意汉、清训诂家以“约”训“克”。这是符合孔子的思想。孔子说：“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（《雍也》、《颜渊》两见）以“约”训“克”，这在《左传》一书也可以找到证明。昭公十年记载：葬晋平公，为了尽葬礼，“子皮尽用其币。归，谓子羽曰：非知之实难，将在行之。夫子知之矣，我则不足。《书》曰：‘欲败度，纵败礼。’我之谓矣。夫子知度与礼矣，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。”阮元在《论语论仁论》一文中说：“颜子请问其目，孔子答以四勿；勿即克之谓也。……一部《论语》孔子绝未尝于不视、不听、不言、不动处言仁也。……此儒与释之分也。”①

“己”训“身”，就是自己，和“我”同义。孔子讲“克己”，就是“约我以礼”也就是“修己以敬”的功夫。因此，阮元说：“马融以约身为克己。从来说如此。……马注以克己为约身，最得经意。……窃以马注申之，克己，己即修身也。故“修己以敬”、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直云修，不云克。”②

了解“克己”是约束自己，还是不够的，还必须进一步了解“克己”的方法和目的。从《颜渊》篇说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、“为仁由己”和非礼四勿表明：第一，以礼克己，是从自我要求方面提出来的为仁的方法。礼是克己的准则和方法，克己是为仁的条件。视、听、言、动，或勿视、勿听、勿言、勿动，皆以礼节之，按照礼做去就是实行了仁；反之，就是违仁或不仁。在这

①②《羣经室》一集卷八。

里，礼是判定是非的标准，以礼克己，就是辨之以礼，不辨之以己，己是从属于礼的。因此，当原宪问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（《宪问》）这是因为：不以礼节之的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”，未必符合礼。不以礼克己，当然不能成为仁。克己不复礼，又失却了为仁的方向，从而不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，所以孔子说：“可以为难矣。”第二，“克己”是为了“复礼”。复礼之“复”，赵纪彬释作“复归”，可取。不过我认为王夫之释“复”为“反”，“反犹拨乱反正在之反。”^①更符合孔子的思想。因为生当周礼崩溃的时代，“复礼”是“拨乱反正”的斗争过程，也是艰苦实践的过程。因此，樊迟问仁，孔子回答说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（《雍也》）正是在这个意义才强调以礼克己，克己的目的为了把已经崩溃了的周礼倒正过来。克己复礼是相互为用的，就是说复礼必资克己，不克己则礼不可复；然而，克己尚须复礼。克己复礼是一个终生无止境的过程。所以孔子说：“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泰伯》）第三、由于以礼克己、“克己复礼”，由此引发出来孝、弟、恭、敬、忠等仁的具体表现。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”（《学而》）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”（《子路》）

其次，谈谈“爱人”。孔子的“爱人”的原则有二：一个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（《颜渊》、《卫灵公》两见）另一个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（《雍也》）“爱人”是推己及人的“立人”、“达人”的行为，也就是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（《宪问》）

^①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六，见《船山遗书》。

关于“人”、“立”、“达”的涵义，我认为“人”既指剥削阶级，也包括被剥削阶级的奴隶在内。“立”是“立于礼”。（《泰伯》）“达”是“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关于“人”，“立”，“达”的具体分析在后边还要谈到。由于“立人”和“达人”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仁的行为，所以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认为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，也是仁的具体表现。

可以看到孔子的仁，首先是“克己”，然后推广到“爱人”，即“立人”、“达人”，而“立人”、“达人”又以“己立”、“已达”为前提。孔子的仁的内容就是“克己”和“爱人”的统一。

二

孔子的仁是朝着谁提出来的呢？也可以说孔子的“爱人”是专指剥削阶级呢，还是也包括被剥削阶级的奴隶在内呢？在具体论述之前，有必要把毛主席的一段精辟的言论摘引如下：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至于所谓‘人类之爱’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这种统一的爱。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，因为它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行的。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，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。”^①有的同志为了论证孔子的“爱人”专指剥削阶级引了这一段言论。毛主席的这一段言论，不仅不能论证孔子的“爱人”专指剥削阶级，反而恰好可以说明孔子的‘爱人’也包

^①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

括被剥削阶级的奴隶在内。同一个理论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？就在于对毛主席的理论在理解上有分歧，有的同志只看到了毛主席说：至于所谓“人类之爱”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。”而忽视了毛主席又讲到所谓“人类之爱”，“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。”片面理解的错误，就是把毛主席论及在阶级社会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且也不可能实行的“人类之爱”，同过去一切统治阶级和所谓圣人贤人喜欢提倡的‘人类之爱’混为一谈了。有些同志认为要断定孔子的‘爱人’包括奴隶，就是抹煞了仁的阶级性，这是把孔子所提倡的仁同孔子的仁的阶级实质完全等同起来了。

从“克己”这个方面来看，既指的剥削阶级，也包括奴隶在内，是易于理解的。以礼克己的基本要求是：臣事君以忠，事父兄以孝弟，“贫而无怨”，“贫而乐”。这样，就可以“复礼”，可以防止犯上作乱。

孔子的“爱人”，主要指剥削阶级而言。其目的是为了调和剥削阶级内部的统治秩序。但也包括庶民、奴隶在内，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，抵制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。

说孔子的“爱人”主要指的剥削阶级，因为第一、仁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统治人民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”（《阳货》）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（《宪问》）第二、仁的君子属性。孔子说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之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（《宪问》）孔子赞许的“仁者”，颜渊除外，尧、舜、泰伯、伯夷、叔齐、管仲、子产都是统治阶级中间的人物。第三、在孔子看来，礼之兴废，在上不在下。他说：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”（《子路》）又说：“上好礼，

则民易使也。”（《宪问》）

为什么说孔子的“爱人”也包括“民”（奴隶）呢？这是问题分歧的所在，论证如下：

（一）在《论语》书中直接谈到仁和‘民’（奴隶）的例证有五。

例1、“仲弓问仁。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（《颜渊》）

这个材料值得重视的是：孔子把“使民”提到“如见大宾”、“如承大祭”的高度。阮元指出：“仲弓问仁，孔子告以如见大宾诸语，似敬恕之道与仁无涉；不知古天子诸侯之不仁者，始于不敬大臣、不体群臣、使民不以时，渐至离心离德，甚至视臣如草芥，靡烂其民而战之。……行不顺，施不惠，家邦皆怨，是不仁之至也。究其始，不过由不敬不恕充之，以至于此。浅而言之，不爱人，不人偶人而已。……孔子惟与颜子、仲弓论南面为邦之道，此章大宾大祭，专指天子而言。周礼凡言大宾客，皆诸侯朝觐之礼。”①孔子提出“使民如承大祭”，说明孔子的仁是作为政治学说而提出来的。同时也反映了“民”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日益增长。“民”的作用的日益增长，是孔子“重民”思想的客观基础。“丘闻之，君者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复舟，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将焉而不至矣。”②孔子回答仁以“使民如承大祭”，紧接着谈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这是孔子的“爱人”包括“民”（奴隶）的确证。

例2、“子曰：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

①《羣经室》一集卷八。

②《荀子》《哀公》篇。